

# 近代赣南墟市变迁初探

戴利朝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杂志社,江西 南昌 330027)

**摘要:**赣南墟市起源甚早,明清时期获得巨大发展。近代以来受动荡的时局与社会变迁的影响,赣南墟市的发展呈现兴衰起伏的态势,这主要体现在:筠门岭等中心墟市的自我发展、抗战时期墟市的普遍兴盛、传统庙会的持续变动、墟市商业贸易的多元化以及墟市与其它各级市场之间不息的互动,等等。

**关键词:**近代;赣南;墟市;变迁

**中图分类号:**K294.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02)04-0046-08

## An Initial Study of Changes of Country Fairs of South Jiangxi Province in Modern Times

DAI Li - zhao

(Periodical Office of Journal,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7, China)

**Abstract:** Country fairs in south Jiangxi province came into being very early and developed fast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modern times, with the influences of the changing times and society, country fairs in south Jiangxi province developed and changed too. Thes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country fairs embodied as follows: the growth of central country fairs such as Junmen mountain, the universal prosper of country fair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he changes of business and trade in country fairs, the constant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temple fairs, and the dependence on each other for existence and mutual contact between country fairs and other fairs, etc.

**Key words:** Modern times; south Jiangxi province; country fairs; changes and development

### 导 言

墟市又称集市、圩场、圩市,或简称圩、市、墟,是指商贾聚集与人们进行商品交换的场所。它是中国广阔农村市场最基本的构成,从更高层次看亦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摇篮、发源地,因为发展市场最先还是从这儿开始的”<sup>[1]</sup>。正因此,对墟市史的研究也就很有必要。然而,有关墟市史的研究,长

时间内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既有成果集中于中国古代,而相对忽略了近代<sup>①</sup>。同样地,江西墟市史的研究也是集中于明清时期,而少有近代史的系统研究成果<sup>②</sup>。为此,笔者将主要依据江西地方史志文献以及相关社会调查所得基本资料,尝试探讨赣南<sup>③</sup>墟市在近代的变迁诸问题。旨在抛砖引玉,期待着方家的教正。

①说详钟兴永《近十年中国集市贸易史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第4期)。造成这种结果自然有多方面原因,但亦与整个历史学界“厚古薄近”的倾向不无关系。事实上,正如有识者指出的,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不仅距离当下最近,而且更重要的是,此期间中国所发生的社会变迁实为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从未有之变局。因而研究这段历史,既可以为学术史补白,又有助于我们理解不断变动着的历史与现实。

②具体到赣南,相关专题研究突出者仅有谢庐明先生《赣南的农村墟市与近代社会变迁》(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等文。

③赣南有独特的地理区位及人文环境,它位于江西省南部,是该省最大的行政区(现称“市”),扼赣闽粤湘四省之要冲,山地丘陵面积为80%,20世纪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曾是中央苏维埃区域的中心部分,也是客家居民聚集地之一。

收稿日期:2002-06-18

作者简介:戴利朝(1974-),男,江西泰和人,江西师范大学学报杂志社编辑。

一、赣南墟市的起源与扩散

1. 赣南墟市的起源

一般而言,墟市的出现与个体小农对商品交换的需求有关,并伴随着人口增加(密集)与经济发展这些现象。根据现有地方史志及文献记载,赣南东晋初,已出现“日中为市”,到隋代发展成“三市”,即大市、朝市和夕市<sup>[2]</sup>(P2156)。然而,它似乎肇源于秦汉。在秦始皇开拓大陆南疆的活动中,赣江航道和大庾岭路为秦军开通。而秦汉军队由赣江河谷南进,

过岭而入广东,势必以岭下为物资存放转运基地。《太平寰宇记》卷一百零八《赣县》中也记有虔州(今赣南)“木客”“与人交易”的资料,而“木客”的消失,应是以杉枋换刀斧不断累积并加快的结果。而交换发展到一定程度,墟市的荫生也就势所必然了。唐宋时江西地方经济勃兴,丰盛的粮产、兴旺的茶叶生产、发达的手工业、交通的拓展以及人口的增殖<sup>[3]</sup>(P120-149,P250-349),既是其写照,也是“居江岭,地扼咽喉,有兵车之繁”的虔州区域墟市兴起的经济前提。据表一,可知唐宋时期赣南墟市已初步发展。

表 1 赣南各县墟市数量变化表

| 朝代、数目<br>县 名 | 时间 | 最早出现 | 明代 | 晚清             | 民国       | 20 世纪<br>80 年代 |
|--------------|----|------|----|----------------|----------|----------------|
| 赣县           |    | 南宋初  | 22 | 40             | 34(1946) | 30             |
| 于都           |    | 唐    | 27 | 53             | 65       | 43(1984)       |
| 信丰           |    | 明    | 41 | 80             | 51       | 28             |
| 兴国           |    | 明    | 21 | 16             | 20(1939) | 28             |
| 会昌           |    | 宋    | 11 | 31             | 34       | 22             |
| 安远           |    | 明    | 不详 | 33             | 46       | 25             |
| 宁都           |    | 不详   | 6  | 49             | 40       | 35(1982)       |
| 瑞金           |    | 唐    | 6  | 34             | 28       | 25             |
| 龙南           |    | 明    | 12 | 16             | 15       | 12             |
| 定南           |    | 明    | 1  | 20             | 18       | 11             |
| 寻乌           |    | 明    | 4  | 22             | 13(1949) | 15             |
| 石城           |    | 唐    | 不详 | 25             | 16(1935) | 13(1981)       |
| 大余           |    | 明    | 11 | 16             | 25(1949) | 16             |
| 南康           |    | 不详   | 19 | 28             | 29(1936) | 25             |
| 上犹           |    | 唐    | 4  | 8              | 12       | 18             |
| 崇义           |    | 明    | 不详 | 25             | 19       | 18             |
| 全南           |    |      |    | 1903 年<br>置虔南厅 | 24       | 16(1988)       |
| 总数           |    |      |    | 496            | 489      | 380            |

说明:

- 1. 资料来自新旧县志。
- 2. “明代”栏除大余、南康、上犹和崇义四县取嘉靖年间数字外,余皆系明天启年间数字。
- 3. “晚清”栏除宁都、石城、崇义、上犹取道光朝数字,余皆系同治时数。
- 4. “民国”栏除数字后用括号标明时间外,余皆年代不详。
- 5. “20 世纪 80 年代”栏除数字后用括号标明者外,余皆系 1985 年数字。

赣南墟市的出现的确不无规律性。比如其地点选择,或交通要道(关隘、驿馆、渡口、桥畔),或城市郊区,或村落集中之处,或寺庙所在地。这些墟市最初也不是常设市场,且极少市场建筑,只有临时性的草棚等简陋设备,甚至无墙屋市门。它们一般不受官吏管理。学者已经证实,唐朝政府对市场有过干预,汉代的邑市与亭市也受官吏管辖,但这些基本上是郡县治所或亭邑所在地。事实上,广大乡村地区的墟市未必与政治中心重合,倒是有的由墟市发展成政治重心,被政府予以重新定位。这反过来又促进了墟市的进一步发展。如上犹县东山镇唐末由于商品交易的逐渐频繁而开圩,形成

墟市。随着墟市的日益发展,南宋绍定五年(1232 年)即筑城于此,东山圩遂逐渐成为该县政治中心。

墟市的最初命名有时附会于传说。更多的是因驻地或建筑物得名。如始建于明代的上犹寺下圩,原址在白米土凹上的白云寺下面,因此得名。明正德年间,此地为崇义县的挖补地,属九龙区,因此一度称九龙圩。1115 年,于都县的柳木坑开置银场炼银,搭设临时圩棚,因而命名银坑圩。位于上犹县西的鹅形圩于清道光年间迁址,因圩旁山形似鹅得名。即是说随着圩址的重建,圩名也随之更改,但却依然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其间不乏群众的智慧与创造性。

2. 赣南墟市在前近代的扩张

墟市的兴起离不开物质基础与劳力流动,其扩散与繁荣有赖于城乡经济的发展;经济基础愈坚实,劳力流动愈频繁,墟市的活力则愈充沛。与社会发展和经济变迁相适应,赣南墟市在前近代的扩张经历了明朝与清代前期、中期两阶段。

明代以前,赣南区域的商业发展并不显著,至明代,粮食、夏布、烟草、茶叶、木材、茶油、桐油、纸张等农产品及手工业品皆有输出;而全国八大钞关中,赣南亦占有其一(即赣关)。作为将本区与区域外的市场联系起来的动脉,赣江——大庾岭商道为本区城乡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明代江西本省经济在宋元时期取得辉煌成果基础上的新跃升以及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也是使墟市发展很突出的因素。以后者观之,赣省区域内的劳力流动(如赣中乃至赣北的农民流徙到南安、赣州二府去佃种谋生)、江西人向外省迁徙(如填湖广与云贵)以及闽广人的入赣等三股移民潮交互激荡,由此引发出新的社会变动,这便是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手工制造业的发达以及商品贸易的更加活跃。在全省经济空前发展的大背景下,赣南墟市飞速发展。据正德、嘉靖和隆庆间的府县志书记载,明代江西超过 10 个墟市的县有 7 个,赣南占有 3 个;超过 20 个的有赣县、兴国、零都、

宜黄、信丰、宁都,其中信丰、宁都最多,嘉靖年间分别有 44、41 个墟市。通计江西 7 府 402 个墟市,以赣州府最多,有 192 个。个中固然有赣州府地广县众户多之故,但的确表现了本区开发加快、经济活跃、墟市扩张的良好势头。当然,此期间赣南兴起的墟市呈现出农村初级市场的诸多特征,比如规模较小,店铺设置随意,甚至没有固定的墟期,只是为满足近墟农民基本的日常生活需要而大量涌现。

由于明末农民战争和清初三藩之乱的影响,明末至康熙初年之际赣南墟市几乎没有发展。康熙后期开始,随着盛世的来临,赣南墟市重新兴旺。以道光朝为下限,清中前期赣南墟市发展呈现出如下新特征:首先是数量上大为扩张,再上新台阶,据方志记载,康乾道三朝本区墟市总数高达 258 个,比明代的总数还多 66 个,康熙朝仅 47 个,乾隆朝达 197 个,道光朝更多,达 258 个。其次,各县墟市发展更加不平衡,信丰与宁都仍高居赣南榜首,分别为 55、49 个,超过 30 个的还有零都、瑞金,超过 20 个的还有石城、崇义、定南,最少的只有几个(参见表 2)。再次,随着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少墟市发展成专业墟市,如宁都就形成了专门的布业交易市场<sup>①</sup>,还有寻乌牛市也相当典型。最后,墟市开始呈现市镇化趋向,对此,学界早有精辟论述<sup>[4]</sup>,此处不赘。

表 2 前近代赣南各县墟市数量表

| 数<br>县<br>名 | 年<br>代 | 嘉靖  | 隆庆 | 万历 | 天启  | 顺治 | 康熙 | 乾隆  | 道光  |
|-------------|--------|-----|----|----|-----|----|----|-----|-----|
| 赣县          |        | 23  |    |    | 22  |    |    |     |     |
| 于都          |        | 29  |    |    | 27  |    | 28 | 47  | 41  |
| 信丰          |        | 44  |    |    | 41  |    |    | 55  | 25  |
| 兴国          |        | 21  |    |    | 21  |    | 8  |     | 16  |
| 会昌          |        | 11  | 10 |    | 11  |    |    | 15  |     |
| 安远          |        |     |    |    |     |    |    | 8   |     |
| 宁都          |        | 41  |    | 3  | 6   |    |    | 38  | 49  |
| 瑞金          |        | 11  |    |    | 6   |    |    |     | 34  |
| 龙南          |        | 12  |    |    | 12  |    | 11 |     | 16  |
| 定南          |        |     |    |    | 1   |    |    | 10  | 20  |
| 长宁          |        |     |    |    | 4   |    |    |     |     |
| 石城          |        |     |    |    |     | 3  |    | 24  | 25  |
| 大余          |        |     |    |    |     |    |    |     |     |
| 南康          |        |     |    |    |     |    |    |     |     |
| 上犹          |        |     |    |    |     |    |    |     | 7   |
| 崇义          |        |     |    |    |     |    |    |     | 25  |
| 合计          |        | 192 | 10 | 3  | 151 | 3  | 47 | 197 | 258 |

说明:资料来自明清赣州府志及各县县志。

二、近代赣南墟市变迁的多重维度

1. 对变迁态势的总估测

① 据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 12.土产志载:“夏布墟则安福乡之会同集、仁义乡之固厚集、怀德乡之横溪集,在城则军山集,每月集期,土人及四方商贾如云,总计城乡所出夏布除家用外大约每年可卖银数十万两。女红之利,不为不普。石城每出夏布,县志曰,石邑夏布岁出数十万担,外贸吴越燕毫间。”

近代在赣南墟市发展史上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段,前承明清,后启20世纪下半叶乃至今天的发展。正是在这期间,赣南墟市总数达到了历史的顶峰,其墟期、交换(市场)主体、分布格局都基本定型,从一定意义上说,以后的发展一方面是以此为基点,另一方面也只是对这种“型式”的完善。

近代动荡的时局、频繁的战争对社会变迁究竟影响如何?不少看法侧重于强调其负面性影响,并突出其决定性的一面。于赣南墟市而言,情形具体怎样?的确,近代赣南遭遇了太平天国运动、民初北伐战争、苏区革命、抗日战争等多重变动。但一方面,民众的生活所需(如油盐)与对交易的依赖不可能被取消,墟市可能受战争的影响出现市面萧条、供需失衡、投机倒把、资本垄断等多种危机,但总体上决不可能消亡。即是说,一俟战争过后,墟市便将回复到以往的水平甚至取得更大的发展。另一方面,从一定意义说,苏区革命期间,墟市曾衰落过,但苏区政府实施的有利举措又促进了市场的恢复与发展<sup>[5]</sup>(P105-113),而抗战对赣南墟市的影响从总体上说也是利大于弊。

由于战争加剧了人口流动,也刺激了移居区对商品的需求,抗日战争时期,赣南墟市普遍一度繁荣。抗战时期,粤湘两省大片土地先后沦陷,粤汉铁路受阻,外地人尤其是粤省兴宁人到定南经商谋生者日增,定南大小墟市都有兴宁人所开店铺,以致“无宁(兴宁)不成圩”。而1943-1945年粤盐多靠肩挑通过定南运往江西各地,本县成为粤赣来往的重要“门户”,每天有数千人运盐过往,沿途膳宿大为发展,客棧林立,有的学校也办起客棧,油潭水和迳脑的大坝村,此期间新建起几十间店房,都曾一度称为“新圩”。全县有大小商店579家,县城下圩坑就有商店94家。抗战时南昌沦陷后,外地迁入宁都的工商业者新开了不少字号,南昌人喻新梅、黄铁白甚至垄断了宁都的盐业。在崇义,由圩发展成为县政府驻地与县城中心的横水镇,道光年间就有粤闽、南昌、吉安、泰和客商至此设馆结帮经营,市场日趋繁荣;民国时更拆建商店,增大街道,由于成为抗日后方,沦陷区商人涌入,1948年有店铺150余家,集市贸易空前活跃。过埠圩1943年有坐商13家,1946年有商店28家,以茶馆、酒店为主,南杂、百货次之。抗战期间,日军侵占华南,不少外商迁入全南市场,开店设铺,1949年春,全县私营、个体商户达640户,从业1121人,共有流动资金11.17万元。由于大批商人南迁,赣县商业网点剧增,全县34个圩镇已有店铺1805家。在瑞金,清末至民初,大多为小本经营的零售商,少数资本较雄厚的当地与客籍商家才兼营批发。抗战爆发后,外地居民大量流落瑞金,客商陆续在境内圩市开店开业,尤其是抗战后期,国民党中央、省级机构纷纷迁入县内,各式应时应景商店、服务社随之出现,商业市场呈现繁荣景象。客籍商人首推粤籍与丰城人,福建与樟树人次之,分别经营着国货匹头、烟、国药业。抗战胜利后,定南商业形势改观,客商有的返回原籍,但本地商家有所兴起。宁都的外籍工商业者大部返回原籍,商业繁荣也渐失。

虽然由于史志资料的有限,难以精确刻画出整个近代赣南墟市的变化曲线,但由表一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几点认识:其一,晚清赣南墟市发展较快;其二,民国期间,墟市数量基本保持稳定,而抗战期间墟市一度繁盛;其三,80年代的数量大为减少,但并不意味着墟市衰落了,而应是其行政区划调整与现代交通拓展的产物,这并不能改变斯时墟市格局在近代已经大致定型这一事实。

江西行政区划在前近代基本确定,近代以来虽出现过反复调整,但其总格局与面积的变化却不大,这也决定了墟市基本布局。同治以后赣南墟市的数量增加不大,但其布局逐渐趋于合理,更适应农村经济发展之需。如南康县同治末年末有墟市28个,1936年则有29个,1950年仍是28个。事实上,江西省光绪年间有墟市1700个左右,平均每县21个,新中国成立初全省共有墟市1746个,平均每县数大致等同于光绪年数<sup>[6]</sup>(P76-77),赣南总体亦然。“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由于广大民众对市场的天然依赖,此圩衰废,必然伴随着彼圩之盛兴,这其实也符合事物发展的基本原理。比如光绪初年,全南县的永昌圩被洪水冲毁,曾、李等6姓乡民联合起来在原圩附近新辟圩场,称“六合圩”。这种例子也屡见于地方志的记载中。

## 2. 商品化的发展

近代以来,受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赣南区域的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商品种类有所增加,墟市贸易不断扩大。墟市逐渐成为“手工业商品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战表演了剧烈的荣枯得失的地方”(毛泽东《寻乌调查》)。

在清末龙南墟市上,除经销本地民间生产的土布外,另有日本产竹布和江浙的绫罗绸缎,以及闽粤的呢绒毡毯等,布业较为兴旺。民初,国产纱布陆续进入市场。至抗战前夕,布的品种已有府绸、安安蓝、毛葛、线春、毛毕矾、华达呢等;抗战后又增加了阴丹士林、小鸡青、学生蓝等品种。民国期间,宁都年产夏布总量约3万匹,外销约2.8万匹;土糖年产总量约1.35万担,外销约0.88万担;土纸年产总量约12万刀,外销约10万刀。烟酒两项向为瑞金县出产、消费大宗:民国年间烟叶年产即可达1万多担,远销沪、汉、宁、广等外埠约七成,本埠销三成;经营酒类者,多取前店后坊、产销合一方式,故酒店酒庄遍布城乡,而县内所销食糖除部分农产土榨糖外,余皆仰赖从宁都贩来的原水、漏水糖(亦属土榨物)。本县还将苧麻制成夏布后出口,清末每年约输出10万担。而作为出产、远销的另一大宗,全县年产土纸1万担左右,鼎盛之年可达4万余担。

寻乌的粮油市场更为典型。民国年间,寻乌是江西省粮油贸易的南大门,重要的粮油市场(墟市)有吉潭等四处,其具体情况是这样的:a.吉潭:以米、油为大宗,1930年后有近10个粮油商行。专营米生意的展通公司与新兴公司分别成立于1932、1935年,分别拥有辆汽车,后者还有3万石资本;兼营的粮商有:潘作醴的协益行(资本1万石,汽车3辆)、刘上池的隆庆与刘大崇的万华(资本各有1千石),刘继坤的望

江楼与刘线三的长发祥(各有资本1千石,汽车1辆)。每逢圩日上市的有1千余担粮食。b.澄江圩:油为大宗,每圩从筠门岭挑来的油可装4船,每船12担,每担约值小洋30元,每年以百圩计算,约值15万元。c.牛头光(南桥):米生意略小于吉潭,油与之等同。d.石排下:粮油豆等物资的重要口岸,多属通过货。另外还有县城的大量交易,清末以来在县城开设的七家米行的资本总数为5千元、20条骡子、1150石米以及2-3车米(1.5万斤)。从安远、筠门岭两方运来的油每个大圩日(逢一)有100担,小圩日(逢四、七)三十几担,全年约1300担。此外,石城、瑞金的米每天有300担经过筠门岭销往梅县;寻乌的牛斗光、中坑和岑峰三条路,输出数量大体相同,每天计输出米100担(每担172斤),全年输出3.6万担,平均每担价8元,全年共计28.8万元。

这些林林总总的进出口商品,成为墟市贸易的主要项目,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赣南区域商品经济在近代的进一步发展。

### 3. 交通的拓展

如果说商品的极大丰富促进了墟市贸易的发展,是墟市繁荣的前提或首要表征的话,那么,交通的拓展则意味着墟市外部条件的改善,它同样可以促进墟市的发展,甚至可以改变墟市的兴衰命运。古代乃至近代墟市择址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即交通是否便利。近代以降,江西在全国的中心干道地位顿失,但江西交通的近代化已经蹒跚起步,赣南也不例外,从公路的拓展到航船的使用都见证着墟市的兴衰。

19、20世纪之交兴起的江西近代轮船航运业与铁路基本上集中在赣南以外<sup>[6]</sup>(P97-111)。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赣江上游的龙南、于都等小型航运港口才兴起。事实上,赣南交通的改善姗姗来迟,且主要体现在公路的拓展上。30年代是江西也是赣南的公路大发展时期,具体表现在:瑞金至长汀的省际公路线接通了,信丰至赣州的公路通车。宁都历史上有八条古代人行道串联全县,全赖人力挑运。30年代中期开始交通大为改善:1934年始筑公路,接通南丰至银坑线;1935年接通宁都至瑞金线和县城至翠微峰线;1945年接通邮村至青塘线,至1949年底,全县共有129公里公路。赣县公路的拓展也同时进行着:1932年始修赣(县)小(梅关)公路;由赣县出东门经邹屋、马鞍石等往于都,为东路主道,县境里程40公里,1935年始改建为公路;出东门入兴国,为东北向主道,县境里程75公里,同年改建为公路;同年接通遂(川)赣(县)线,里程70.5公里,至1949年,全县有赣小、赣遂等4条公路,县境内总长110.6公里,桥梁44座,长856.3米。

随交通的变迁而发生变迁的墟市例子很多。如在寻乌,清末民初,于都、瑞金、会昌的货物水运到罗塘,再肩挑到广东下坝,罗塘圩因此成为农副产品的集散地;30年代初,修通瑞(金)大(岑岭)公路(安远、会昌、宁都、瑞金、于都诸县均须

通过此路到达粤省)后,吉潭成了县内南北交通要冲,因而商业繁华,贸易活跃,是三边区域商品交换的重要市场之一;1935年,县城至吉潭的公路修通,商业中心又由吉潭移到县城。在全南,1933年龙南至广东小碌的公路修通后,外地商人纷至沓来,小蒸圩、南迳圩、大庄圩和竹山圩等沿途墟市的商业贸易更加繁荣。公路的修筑也会对会昌筠门岭、寻乌罗塘等墟市的兴衰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941年《新赣南旬刊》中记载的当时寻乌县长刘菁如在第四行政区扩大会议建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关于修筑罗吉公路的提案,可资印证。提案说道:

……罗吉公路,以寻乌罗塘为起点,到平远善吉为终点,全程计一百华里,在三年计划完成公路网的规定中,这条路是没有的,这是哥伦布新大陆的发现,这是抗战发生后的奇迹,在国防方面、经济方面、治安方面有极大的作用和无限的价值!

罗塘是赣江上游贡水发源地,善吉为韩江上游的重要市场,船只往来,水利方便。昔日本省大宗输出,米、豆、茶叶、烟皮、磁器、夏布……,由南昌、吉安、赣州、会昌筠门岭集中罗塘;广东运入本省之食盐、洋货、布段……由汕头、潮州蕉岭集中善吉,再由整千整万的挑夫、骡马不断的交流式的互通有无,解决了两省间重大的民生问题。

自民国二十五年,筠门岭到坝头(广东平远属)公路完成通车后,两省间的货运,从此很少经过罗塘、善吉了。筠门岭、坝头繁荣起来了,而罗塘、善吉则一落千丈、萧条不堪,今昔全非矣,即有肩商与骡马搬运,亦被福建土匪钟隆部一次再次、千次万次的抢劫,弄得商人,裹足不前,齐声呼叫“行不得也哥哥”!

尽管公路状况较差,汽运费用也昂贵,但它却集拢了大量的肩挑马运,车运的转运站也落脚于筠门岭,使之成为腹地出境前的唯一集散中心,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它的繁荣。

总体上看,赣南交通在近代主要是30年代以后确实得到很大的改善,尽管“交通靖匪”<sup>①</sup>的色彩浓厚,但这客观上加速了赣南墟市的内引外联,从而有利于市场间的互动。

### 4. “插花集”的普遍化

墟市大多定期开放。据调查,20世纪80年代以来赣南墟市基本上沿袭了传统墟市的墟期,即使有所变动也依然遵循着同样的规律。“插花集”与定期集实际已成为民国年间江西最常见的集市贸易形式。前者即各圩日互相错开,以利于群众赶集。这种形式有固定的墟场和集期。赣南一般是三天逢一次圩期,即相邻的几个墟市的墟期分别采取农历的“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或“四、七、十”。这就是说,从局部看还是定期集,但从总体看却是常市集。因为在方圆几十里之内,农民每天都当圩。也有非三天一圩

<sup>①</sup> 30年代初,由于“围剿”屡屡失利,国民党政府高层提出了“交通靖匪”的思想,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将“筑路剿共”列为其施政的六大方针之一,先后出台相关政策,新修了1110公里路程,这是前20多年江西所修路程的近10倍。

的,如石城县的墟市墟期一度改为5天一圩,1935年共16个墟市,其分布是:逢农历一、六当圩的有3处,逢二、七的有4处,逢三、八的有3处,逢四、九的有2处,逢五、十的有4处。百分之百的是定期墟市,又将墟期错开。这种灵活的设置,同时意味着圩市的布局已经成型。近代赣南墟市的墟期还有不定期墟、半定期墟、常墟(日日墟,没有隔期)等三种,但总体上间隔时间不断缩短,一方面是开墟日期在增加;另一方面是“插花集”的普遍化。

#### 5. 墟市主体的多元化

近代墟市贸易中,已有大量的商贾参与其中。而各种群体的活跃,表明墟市的组织构成已明显呈现多元化特征。

清末民初定南墟市设有“团总”,由地方绅士或大姓要人充任,霸道商街;而商会与同业公会则主要负责协调顾主间关系和派税、派伕、派义务。40年代,宁都市民粮食供应逐渐控制在粮商手中,粮商又分两类:一类是把粮油运销赣州、广东等地的行商;另一类是肩挑贩运的小商贩,从农村收购粮油后再到县城或圩市销售。民国年间,县城与较大的集市设有米行、豆行、花生行、油行、米店共112家。这些商行逢圩日开放,买卖粮油者到指定的行内交易,“伕人”负责定价,并收取买卖双方1%的手续费。而由私人粮商开设的粮行,也会雇用帮工数人,坐行等商,代行买卖。民国时期,瑞金私营商业者大多数是邻县龙南和广东兴宁等地迁入的客商,主要经营布匹、百货等商品。客籍商人为维持自身的利益不为本籍商人侵犯,并协调进销价格、通融资金,各依地域组成乡帮,出现了广东帮、福建帮、丰城帮,依行业组成行帮组织如蛋头行、国药行和烟叶行等。而在赣县,私营工商业者还以同乡关系组成了南临帮、吉泰帮和赣州帮等七大商帮。

以上仅是市场主体的一部分,据30年代初毛泽东所作的农村社会调查,多元的墟市主体构成主要有:农民、手工业者;坐商、囤户(墟市上主要买方之一,多半为当地地主与富农,也有商人);零售商;摊贩;批发商;客商;加工商以及伕人等九类,关于其例子及活动状况,《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有非常细致而独到的介绍,此处限于篇幅,兹从略。这尽管是寻乌、兴国的情况,但亦适用于赣南区域。

#### 6. 服务行业的扩展

进入近代,赣南墟市的服务行业也有扩展。清末民国时期,上犹全县有茶店56家,酒店144家,饭店113家,各圩场及部分边远山区通道均设有饭店兼住宿和南杂货店;各圩场还出现了个体染坊、理发店、个体刊刻户和钟表、单车、雨伞等修理户。1927年,县城有客栈1家,至建国前夕有12家,农村墟市则有简易客栈66家。全南县南迳圩,圩区呈正方形,四周设店铺,中间有3150平方米场地的集市区,民国时设有商号20余家,人口二三百,还设有万寿宫、观音庙、小学等公共建筑,多为土木结构的房屋。1936年,江西矿业管理

处赣南分处第12事务所也设于此圩。茶馆、理发业是近代以前瑞金主要服务业,民国时则兴起了照相、钟表修理、洗染、委托社等行业。而崇义全县集市贸易以木、竹业与纸业为大宗,日间交易(古:以日中为市)未成,继之夜市,形成专业性集市。晚清政府颁布奖励实业政策后,赣县商业日趋繁荣,货栈、船行、渔行、百货、土产、糖业、布业、糕点、酱园、饭庄、国药、杂货、造纸、铁器、缝纫、酿酒、屠宰和油坊等各种行业出现于城乡市场,据1946年《赣县新志稿》载,全县已有42种行业,425个店铺。

#### 7. 传统庙会的经济意义

近代墟市的发展形式更加多样,其突出体现之一便是传统庙会的兴盛。据调查,赣南庙会的历史源远流长,至今在许多地方都依旧盛行<sup>①</sup>。我们不妨先回到当年的高田牛马岗会去看看。

高田属石城县,元代开始形成墟市,成为县邑东北部的集市贸易中心,四向皆有繁荣街市。由于地处“闽赣通衢”,过往客商与年俱增,至17世纪中叶起开始出现牛马岗会。牛马岗会是怎样兴起的?原来,高田于康乾年间建起了将军庙,此前相邻地区已有六座将军庙。这样,每逢农历九月初一即高田将军庙会期,各地将军庙的将军菩萨塑像都要抬到高田“会面”。为示庆祝,各地民众剧团是日要高田庙公演一天,而后连演弥月。庙会期间,锣鼓声声,不分昼夜;商贾云集,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如此久而久之,终至声播遐迩,引来数省客商,造成了声势浩大、盛极一时的牛马岗会。庙会期间,市场异常繁荣:安徽商人运来大批驴马牲口,浙江客商运来各种日用百货,湖北客商运来大量羊皮、药材,广东商人带来名产绉纱、香云纱等布匹,福建商人也运进大量纸张、闽笋、海产,还有湖南客商也运来大量时新货物。本省樟树、临川、南丰以及临县客商分别带来名贵药材、文房四宝、灯蕊、夏布等土特产品与外省客商进行贸易。庙会期间的畅销商品有驴子、羊皮绉纱和土纸,最主要的是牛马,有时交易的牛多达1000余头。因而后人习惯称之为七省牛马岗会。不光生意繁荣,由于客商如云,赌业随之兴盛,各地妓女也赶来“做生意”,多时达30余人。高田周围先后兴建客店30余家,交易市场已扩大到方圆十里之内。热闹非凡的高田庙会,由于民国初年与1930年先后两次遭土匪抢劫,逐渐萧条。但其兴盛时间长达近两个世纪,被称为石城“商业贸易史上的闪光时期”<sup>②</sup>。

此外,瑞金的庙会又称神会,为一方各姓联合所为,因祭祀对象的不同又分为观音会、真君会、福主会、花神会与罗光会等多种。每逢神的诞辰,杀猪宰鸡,烧香祭祀。庙会期间,不仅迎神竞技,演唱古戏,走亲串友,甚至开台聚赌,而且同时也交流物资,始终伴随着大量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

① 新近的相关研究成果也证实了这点。尤以下面两部书最为突出:罗勇、劳格文主编,1997,《赣南地区的庙会与宗族》,劳格文主编:客家传统社会丛书之三;罗勇、林晓平主编,1998,《赣南庙会与民俗》,劳格文主编:客家传统社会丛书之七。

② 朱祖振整理的《高田的牛马岗会》一文详实地介绍了相关情况,本节介绍基本取材此文(载《石城文史资料》第三辑,1990)。

流等,蕴含着丰富的经济意义与社会文化意义。庙会极大地拓展了商业贸易的范围,而且丰富了乡民的日常生活,也不啻为另一种“墟市”。

#### 8. 中心墟市的发展逻辑

中心墟市的规模比一般墟市要大,常住及流动人口多,其商品种类多,流通广;从职能看,它与一般墟市一样都是周边农村的交易中心与货物转运地,但它同时又是邻近数乡至多县的贸易中心与货物集散地,它也常与乡镇政府所在地重合,在农村由村至县的市场网络体系中,中心墟市的地位仅次于县城。一般以为,自近代五口通商以后,大庾岭商路很快萧条,由昔日的繁华跌落至谷底,江西近代经济随之落后于其他先进省份,而赣南经济也同样趋于衰落。历史实际是否如此?不妨先来看看一些中心墟市在近代的发展情况。

唐江镇。位于县境中部,上犹江北岸口,历来是南康县乃至赣南最大的墟镇,素有“小赣州”之称。乾隆年间“人烟错杂,庐舍市肆,十倍于前”,墟市刚刚发展。道光初年,墟市经营的商品既来自本区各地,又来自区域外的遂川、吉安、樟树以及广东;而本地所产农副产品土特产品远销赣州、吉安与樟树等地,远销南昌、广东、南京、上海等地,一个初级市场网络已经建立。同治年间“临犹川为市,商舶尾街,市廛鳞接,为虔南大镇”。清末民初,唐江商业更加发达,也是全县水路运输中心。除远航赣、吉、泰、樟、昌等地的木船外,还有短途运输之“圩船”。1929年,有圩船快船8艘,每三天(逢圩日)往返一次,除乘少量客商外,主要代客装运生产、生活物资和农副产品。这加速了该墟市商业资本的流通与积累。1927年,该墟市商业资本在万元以上的有20多家,其余商户资本皆达千元或数千元不等,全年商品成交额200万元(银币,下同)。1935年,该墟场仅棉布业就有60家商店,全年营业额19.26万元;1945年,分别有糖棧业30余家,墟日糖销量500担,木行业10余家,绸缎棉布业28家,全年销售额10.12万元,京果南什货业商店20多家,纸张文具业12家。此外,酒业、盐业、油行业、米业分别有10多家。1947年全墟有商店699家。

筠门岭。1985年《会昌县地名志》载“明万历中期(约1600年左右)梁国标从福建迁此搭棚卖烟、茶,尔后日渐成圩”。雍正年间随着广东人大量入赣,筠门岭商道(贡江—会昌—筠门岭—福建武平、广东)的繁荣已初见端倪。筠门岭作为转运、集散中心,道光年间已经“冠盖辐辏、商旅络绎”,光绪年间已发展到5条街,2个圩坪,300多间店房。因其商业繁盛,清末这里已设有统税局与盐务局,1911年成立商会,比县城商会成立还更早,并在级别上与后者平行,直属省商会联合会,筠门岭商会有30多名武装自卫队员,专事保卫富商巨贾。1929年常住人口达5800多人,升格为镇。1933年,苏区政府在此设立会寻安中心县委及关税总局(隶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管辖)。抗战期间,这里一度成为“虔南第一镇”,全国十几个省市的商家在此设铺经商,常住人口5000多人,过往商船多达五六百条,中国银行、

中央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广东银行、裕民银行等都在此设有办事机构。其知名度已远远超过县城,甚至有些境外人士知筠门岭而不知江西<sup>[7]</sup>。可见,整个近代筠门岭圩并没有衰落,而是大为发展,臻于繁盛。

地处一隅的崇义县扬眉寺圩,距县城35公里,自明清以来一直是本县人口集中、贸易发展的大市场,近代也更为发展与繁荣。清末民初,相邻的仙姑庙、牛鞭潭两圩相继消失,新溪圩也趋于萧条,这给扬眉寺圩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良机:附近各地矿山居民均来此赶集,出售钨砂、购买生产和生活资料;邻县南康、上犹、大余等地群众、客商也定期来此交流土特产品。抗战期间,该圩无论设施还是规模皆有所扩展:1941年有122家店铺,1942年兴建了新街道,1946年搭建菜市场,经营范围大为拓展,促进了商贸的繁盛。

紧邻广东连平县的全南大吉山,1918年由于在这里发现钨矿,远近民众纷纷入山拣钨砂,多时一天达数千之众。地表钨拣完之后,即转而开沟、挖湖、凿窿。1923年民隆开始开采,民工大增,1929年有大隆主上百家,民众2万余人,每月产钨350—400吨。人口的集中与交换的频繁促使了大吉山墟市的形成。该圩很快有200余米长的街道1条,板皮房100余间,居民1327人,1941年升格为镇,集市交易额仅次于全南县城。

此外,建于宣统三年(1911)的瑞金县叶圩乡云集圩“每逢圩日,乡民辐凑云集”;上犹县的营前圩民国年间一度有300多间店房,10个交易场所,市场繁荣,故有“头唐江,二营前”之说。还有像信丰的古陂圩同治年间才建立,但不久即跻身于赣南四大镇之一。

至此,我们看到了一幅幅墟市发展乃至繁荣的图景,尽管它们未必代表了近代赣南墟市状况的全部,但至少揭示了赣南墟市与大庾岭商道乃至江西经济发展的某种不同步。正如论者指出的,大庾岭商道在清代对赣南乃至江西造成的影响并不像通常我们认识的那么大,清代赣南墟市的发展有着自身的逻辑<sup>[8]</sup>。清代如此,近代又何尝不如是?我们认为,近代赣南墟市并没有随着大庾岭商道的衰落而萧条,而是在曲折动荡中向前发展。当然这种发展的市场化进程要落后于沿海地区乡村市场。

#### 9. 互动的市场

乡村墟市作为农村基层的商品集散地,与上层市场即更高级的县、市、省乃至国外市场都处于互动的态势,这成为墟市发展不竭的活力。近代以来,区域内的、区域外的、省际的以及国际的等四个层次的市场互动在赣南经久不衰。从一定意义上说,这多重互动都以墟市为基点,商品的聚集与流转均离不开这一舞台。

在定南。近代其商品流向一直具有“与广东互动”的特征:布匹、百货、煤油、咸鱼和中药材等大都从广东兴宁运进;本地的竹木,岭北的放运赣江,岭南的流入广东珠江;土纸、生猪、米谷、香菇等农副产品大都流向广东。30年代全南也有“无广不成圩”之说,素来“粤货北上,县土特产南下”,清末

至民国,境内土纸、香菇、木耳、笋干等大批销往南粤,而粤地布匹、百货、食盐及海产品则源源流入县境各圩场。该县每年销往南昌、南京等地杉木达8万多株。在宁都,自产的稻米、烟叶、夏布、土纸、土糖行銷闽、穗和港澳,以换回生产资料;其棉纱、布匹多从清江、南昌、丰城等地购进;煤油、西药等大多数来自美国、日本,1935年起“美孚”煤油进入县境,垄断了全县市场;而外销的夏布、土纸、晒烟等,从陆路挑运至福建汀州,经厦门出口至东南亚,钨砂则远销西欧,也有从水路运销南昌、武汉等地,或从陆水路运至赣州、鹰潭等地中转出口。瑞金所产纸以湘省、南昌、吉安和赣县为主要销售对象,并一度远销上海和南洋。寻乌在边界贸易中一向处于中转地位,南昌、石城、瑞金、信丰、安远的农副产品销往广东或赣州的货物销往东江都主要经过寻乌,而广东梅县、兴宁等县的工业品和海产品,也要经由寻乌销往江西东南数县。

在这互动的市场网络中,墟市亦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并在参与互动的过程中显示出自身的活力。在崇义、赣州、唐江和外地的湖南、广东客商在各圩场均有出入,与湖南接壤的上堡圩、古亭圩、文英圩和与广东交界的聂都圩都较繁荣。上犹的营前圩米行,清末销售粮多可达1万余石,是湖南桂东及崇义、遂川粮食销售的中心市场。瑞金日东圩位于县东赣闽交界的边沿山区,每逢圩日,瑞(金)、石(城)、汀(福建长汀)民众自四方纷至,交流山货与农产品。壬田圩素为赣省之瑞、宁、石,闽省之汀、宁化等县边民集散各类土特产品的贸易场所。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中期,吉潭作为寻乌交通和经济的中心之一,瑞金、会昌的油、豆、米以及广东的南杂货在此集散,赣闽粤三边区域的客商云集于此。无疑,吉潭虽然只是寻乌一墟市,但却发挥着沟通三边区域贸易的中心市场之作用。类似的赣闽粤三边中心还有前面所说的筠门岭等。

## 结 语

学界已经指出,19世纪70年代初期以前,华北集市还保

持着明清时期的态势,继续缓慢发展;70年代以后则发生了千百年来所没有的变化,包括商品结构、参与集市活动的主体结构等。由于外国侵略势力深入及天灾人祸,集市走向衰败<sup>[9]</sup>。而20世纪上半叶,闽西墟市正处于繁荣,这显示出该地区社会经济某种滞后色彩<sup>[10]</sup>。我们的考察则表明,近代以来赣南墟市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尽管也深受近代动荡的时局以及社会变迁的影响,其发展可谓兴衰起伏,既没有走向衰败,亦非始终繁荣,无论是筠门岭等中心墟市的自我发展、传统庙会的持续变动、抗战时期墟市的普遍兴盛,还是“插花集”的普遍化、市场主体的多元化以及墟市与其它各级市场之间不息的互动,等等,都揭示了这点。

## 参考文献:

- [1]李岚清副总理在听取国家工商局工作汇报时的讲话(1992年12月24日)[A].钟兴永.近十年中国集市贸易史研究概述[C].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4).
- [2]赣州地区志[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4.
- [3]许怀林.江西史稿[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3.
- [4]许檀.明清时期江西商业城镇[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3).刘石吉.明清时代江西墟市与市镇的发展[J].台湾中研院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1989.
- [5]何友良.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 [6]温锐,廖信春等.百年巨变与振兴之梦——20世纪江西经济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 [7]丁晓春.家族与商镇——以筠门岭商镇为个案[D].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7.
- [8]黄志繁.清代赣南市场研究[D].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8.
- [9]乔志强,龚关.近代华北集市变迁略论[J].山西大学学报,1993,(4).
- [10]戴一峰.环境与发展:20世纪前半期闽西农村社会经济[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4).

(责任编辑:言 真)

(上接第37页)

督机制,使农民负担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增加农民的实际可支配收入。

在现阶段努力增加农民收入,既是当务之急,又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工作,所以要正确处理好政府推动与尊重农民意愿的关系,处理好适应性调整与战略性调整的关系,处理好结构调整与农民增收的关系,把“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作为“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作为“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业发展的制度基础”,“不能下指标,不能强制推行”<sup>[3]</sup>。

## 参考文献:

- [1]“三个代表”学习读本[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
- [2]温铁军.慎言“三农”[J].改革内参,2001(15,16).
- [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召开[N].光明日报,2001-11-30.

(责任编辑:余小江)